

12873.63
2

主 编 谭维四
副主编 万全文 郝勤建

湖北 出土文物 精华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1	湖北半个世纪的考古收获
13	陶器与陶塑
33	青铜器
105	漆器
153	金器、玉器和料器
181	丝织品与刺绣品
201	简牍
213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50 Years in Hubei
222	后记

湖北半个世纪的考古收获

谭维四 万全文

时间如逝水，匆匆而过的半个世纪却是湖北考古的黄金岁月，一次次重大发现，一项项重要收获，将湖北的考古事业推向辉煌。

湖北位处长江中游，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生长点。“郧县人”的发现，表明50万年以前，湖北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湖北更是古代先民们的聚居地，迄今已发现近千处聚落遗址。先秦时期，在这里发展起来的楚文化博大精深，与中原文化同为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秦汉以后，这里仍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因而得以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在各领域内不乏英才硕果。

正是辉煌的古代文化，为湖北这块土地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为湖北赢得了“文化聚宝盆”的美誉，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天地。

50年来的考古，不仅发掘了大量的古代遗址、墓葬，而且出土了大批文物，如陶器、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皮革制品、金器、玉器、料器以及简牍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物，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又有十分珍贵的艺术价值，即使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就是在这大批出土文物的基础上，撷珍选萃，分门别类地予以介绍，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湖北50年来的文物考古成果。

一、史前考古的主要收获

(一)古人类化石的发现

早在1956年，考古人员就在湖北长阳县钟家湾发现1件人类上颌骨化石，次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1颗牙齿化石。长阳人化石属早期智人，距今约10万年左右。这是中国南方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在早期智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1970年至1975年在湖北郧县梅铺乡发现4枚人牙化石，经测定，距今已有七八十万年左右，是湖北境内发现最早的猿人化石，通常以郧县猿人称之为。

1976年至1982年，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8枚人类牙齿化石，经测定时代为更新世中期，比郧县梅铺乡猿人晚，与北京猿人时代相当，一般以郧西猿人称之为。

1989年至1990年在郧县曲远河口获得两具人类头骨化石，这是历年来湖北地区古人类化石发现中重要的一次。经研究，其特征为直立人，时代距今约50万年，学术界称之为郧县人。与头骨化石伴出的还有数十件石制品。

1997年，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山发现古人类颅骨化石，经研究，为晚期智人，学术界称之为汉阳人。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掘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近年来在湖北各地陆续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遗存，如在枝城九道沟遗址发现石制品395件和动物化石10多种；在丹江口石鼓山发现石制品28件；在房县樟脑洞遗址发现石制品近2000件及10多种动物化石。所获打制石器常见的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盘状器等。

在所发掘的遗址中，最重要的一处是荆州市郊鸡公山遗址。1992年发掘了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中的400多平方米，发现了两期文化堆积。第一期距今约5万年，第二期距今约2万年。在遗址中发现有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是清理出古人类的居住活动面，发现了5个由砾石围成的圆形石圈和脚窝痕迹。这是我国迄今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平原上的活动遗址，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发掘

湖北地区最迟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进入青铜时代。考古发掘表明，在4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湖北境内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城背溪文化。城背溪遗址于1973年发现于湖北枝城，经过80年代的发掘，被认定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文化遗存，距今在7500—5000年之间，是湖北地区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城背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广，在宜昌市长江西陵峡的内外，发现有十几处城背溪文化遗址；在湖南的洞庭湖区及澧水流域也发现了许多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遗存。在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器类主要有斧、锛、球、网坠、盘状器等。所出土的陶器主要采用泥片贴筑法成型，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一种相当原始的制陶方法。陶器品种主要有釜、钵、圈足盘、支座及陶纺轮等，饰绳纹的约占70%。因可能在露天烧成，故陶质疏松，火候不高。

人工栽培水稻是城背溪文化原始农业中最突出的成就。湖南考古人员发现，“在彭头山遗址陶片中夹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谷”，同样的遗存也发现于宜昌的城背溪遗址中，城背溪文化的稻作农业在稳定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溪文化。大溪文化以首先在今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发现而得名，它是鄂西地区继城背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在6300—5000年之间。

大溪文化发现之初，人们以为它只是峡区里面的一种原始文化。70年代中期以后，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陆续发现了大量大溪文化的遗址，人们才认识到其分布中心在峡区以东，分布范围较大，可分成几个地方类型。

大溪文化的手工生产较城背溪文化有着明显的进步。石器普遍磨制，出土的许多石器制作精美。在宜昌中堡岛和枝城红花套遗址中还发现有制作石器的作坊，说明大溪文化的晚期在石器制作方面已经出现社会化的分工。陶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大溪文化晚期，在长期使用慢

轮的基础上，发明快轮制坯成型，所制陶器圆正而轻巧美观，以薄胎彩陶最为突出。红陶占大多数，主要纹饰是戳印纹。有少量彩陶，主要是红衣黑彩，其典型的纹饰为横条纹、横人字纹、水波纹、绳索纹等，都是取材于水的不同流态，表达了制作者对水的深切感受。玉器的种类则有璜、玦、镯、坠、环、管等，主要出土于墓葬中。

大溪文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占一定比重，房屋建筑则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

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发现于1954年，次年发掘，是在我省境内考古工作者运用科学方法首次发掘的古代遗址，其年代约在距今5000—4600年，大体上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相当。

屈家岭文化是继大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汉水中下游、长江与汉水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迄今已发现和发掘的遗址有数百处之多。

屈家岭文化的制陶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快轮制陶已经普及，陶器的烧制火候明显提高，出现了精美的薄胎晕染彩陶。陶纺轮的数量较大溪文化明显增加，形态也有显著变化，由大而厚重变为小而轻薄，说明屈家岭文化的纺织手工业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近年来在江汉地区发现了至少8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其中石家河古城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左右。古城四周都有壕沟和城垣，有些城垣至今尚有5米多高，30米多宽。这些筑有城垣的古城，一般也就是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城垣防御体系的构筑，说明当时社会组织和公共活动的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在各地屈家岭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相当多的宗教活动遗迹和遗物，如祭祀坑和巨型陶祖，说明宗教活动盛行已成为屈家岭文化的重要特征。

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而得名，其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它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大体上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约距今4600—4000年。

石家河文化时期是江汉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其突出的标志是手工业的发展与独立。首先是制陶业的进步，此时制陶业已突破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成为一项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在已发掘的许多聚落遗址中，都出现了专业的陶器作坊而且各作坊间还出现了产品品种之间相对分工。如石家河的三房湾遗址，仅在100平方米的地表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红陶杯，显然这是一个专门生产红陶杯的作坊所在地。而在这个作坊附近，还有专门生产陶塑小动物和彩陶纺轮的作坊。

其次是治玉业的发展，从石家河文化晚期兴起的治玉业，也应是一种专业性的生产。石家河的玉器已发现5批，总数近300件，绝大多数出于晚期的瓮棺葬中，如石家河肖家屋脊的6号瓮棺中，一次出土56件，且多为精美之作。

再次是冶铜的出现，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属于石家河文化时期遗留的铜矿石碎块，且出土了少量的铜渣。青铜器的出现，一般视之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石家河文化晚期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尚不能确论，但至少可以说已踏上了文明社会的门槛，登堂入室已指日可待。

经过50年的考古发掘，对于认识、了解江汉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及其传承以及不同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已能建立起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完整谱系，对于完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有重要意义。

二、商、西周考古的主要收获

(一)商代的考古发现

湖北地区的商代考古，长期以来是个空白点。1954年在黄陂盘龙城发现商代遗址，1963年进行了初步调查发掘，1974年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外，还先后发掘了江陵荆南寺、沙市周梁玉桥等数十处商代文化遗址，为探讨商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盘龙城遗址经过1974年、1976年两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确定它是属于二里冈上层时期的一座城址。城内有大型的建筑群，第一号宫殿基址可复原成一座四阿重屋式的高台寝殿建筑，四周有回廊，中央为四室。在这个宫殿基址的南北中轴线上，还有第二号、第三号基址，其中第二号基址可能是一座两侧开门的厅堂式建筑。这两座建筑与文献记载中的前堂后寝的建筑布局极为相似。而围绕着这组建筑群之外的城址，可能是宫城性质的防御设施。

在南北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城址的四周分布着密集的居住遗址，应为当时一般居民的居住区以及制陶及铸铜等手工业作坊所在地。

在盘龙城的楼子湾、李家嘴、杨家湾等地，还有大批同时期的墓葬，遗址和墓葬中迄今已出土青铜器400余件以及玉器、陶器等。

盘龙城遗址及其所出土的器物，其文化内涵与中原高度一致，诸如城墙的营造技术、宫殿的建筑方法、埋葬的风俗以及青铜铸造工艺、制玉工艺、制陶工艺等，无一不与中原相同。这座与殷人关系深厚的城址，应即由殷人营造而成。根据发掘所得的资料判断，它既不是一个普通的居民聚落，也不可能是商代的一个方国遗存，而应是殷人设置在长江中游的一个据点。殷人建立盘龙城的目，除开疆拓土外，主要是借以控制长江中游的红铜产区。

殷人凭借强大的兵力向南推进，商文化随之向

南播散。盘龙城所在的江汉地区得近水楼台之利，故受商文化的影响既早且深。

盘龙城扼长江中游，居南方通中原的要冲，殷人因此把它作为跳板，深入到今江西、湖南境内。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长江流域商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遗址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长江流域已发现的商代遗址中首屈一指。其二，城址由殷人直接营建，成为商王朝开拓南方的一个军事据点，这在长江流域已发现的商代城址中独一无二。其三，出土的青铜器群表明，殷人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对于推动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四，在商代中期以前，盘龙城应是江汉地区的文明中心，而且是中原商文化向南播散的中转站。

在商代晚期，盘龙城文明中心已不复存在，但考古工作者在江陵、沙市等地发现并发掘了荆南寺遗址、周梁玉桥遗址等，并出土了尊、鬲等精美的青铜器。这几处较为集中的遗址，或许表明商代晚期文明中心在江汉地区的转移。

湖北境内除发掘上述几处商代早、晚期的遗址外，在各地还零星出土有青铜器，以崇阳汪家嘴出土的一件铜鼓最著名。

（二）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

据文献记载，早在北宋时期，湖北安陆就有西周时期的“安州六器”出土，其中中方鼎、中鬲等器铭文记录了周昭王南征伐虎方的重要史实。

50年来，湖北境内的西周考古主要是发掘了一批遗址和墓葬，最主要的则是出土了一批青铜器。

发掘的遗址主要有红安金盆遗址、蕲春毛家嘴遗址、黄陂鲁台山遗址和墓葬、新洲香炉山遗址、随州庙台子遗址、江陵张家山—荆南寺遗址、

松滋博宇山遗址、秭归官庄坪遗址等。

上述遗址分别分布于鄂东、鄂中、鄂西等地区，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如以蕲春毛家嘴为代表的鄂东西周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以红褐陶和橙黄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纹饰有绳纹、索纹、弦纹，而其主要纹饰为切条纹和印绳纹。其独特的陶器为刻槽足鬲、带角状把手鬲、带耳甗、长方形镂孔豆等。这种文化特征与邻近的安徽、江西两省的同时期文化相似，应属吴越文化系统。

以新洲香炉山、黄陂鲁台山为代表的鄂中文化遗存，则是中原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并存。在西周早中期，中原特色占主要地位。至西周晚期，土著文化渐占主导地位。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鬲、罐、豆、甗、盂、钵、盆等。西周初期，周成王东征之后建侯卫，在汉东和汉北分封了一些姬姓及其它异姓诸侯，史称汉阳诸姬，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姬姓诸侯带来中原文化是顺理成章的。

鄂西地区的西周时期文化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遗存如松滋博宇山遗址等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与相邻的湖南澧水流域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应属同一文化系统。晚期的文化遗存如江陵张家山—荆南寺遗址、当阳磨盘山等可能属于楚文化的早期遗存，出土的器物以鬲尤多，鬲有大口、小口之分，足窝较浅，联裆，足跟两次包制，为高锥足或截锥足。这种鬲与东周时期的楚式鬲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在湖北境内发掘的西周时期墓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其一，为殷遗民的墓葬，如1961年在江陵万城发掘的一座西周早期墓出土青铜器17件，其中鼎和甗上有铭文：“北子”，是商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氏族的徽记，“北”据郭沫若考证为邶国，位于河南淇县之北。北子诸器很可能为殷遗民之器。

黄陂鲁台山的5座西周墓发掘于1977年，共出土青铜器47件。5座墓中以30号墓等级最高，有墓道，随葬5鼎，有铭文的青铜器大多出自此墓。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为“公大使乍姬姜宝罍彝”类，一组为“长子狗作父乙罍彝”类。墓主应是长子狗，或谓长子狗为“殷遗民”，是“箕子后裔”，确否姑且不论。长子名乙，而以日为名是殷人的习惯。从这一点来看，长子既非周人亦非楚人。因此，说长子狗为殷遗民颇有道理。长子狗的夫人则为姬姜。因此，此墓也可视之为殷遗民的墓葬。

其二，为一批在随州、枣阳、京山等随枣走廊地区发掘的墓葬，墓主多属“汉阳诸姬”，以曾(随)国为主。在这些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风格与中原地区一致。

其三，在当阳赵家湖墓地发掘的楚墓，这是可以确定时代的最早的楚墓。其墓坑浅小，单棺，有的带有壁龛。多数墓随葬鬲、盂、豆、罐等日用陶器，少数墓出土鼎、簋等青铜器。这些楚墓是探索早期楚文化的重要资料。

三、楚文化考古的成果

楚是西周初期分封在鄂西北的一个异姓小国，“土不过同”。楚人以其“筚路蓝缕”的精神顽强发展，春秋早期，已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至春秋中期，楚成王出入中原，擒纵淮夷，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当时楚国在疆域、人口、财富、甲兵等方面已成为并世诸国之冠。楚成王孙楚庄王问鼎周室，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时期功业最显赫的一代霸主。在春秋中晚期，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而且富有发展的潜力，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此后直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作为楚国故地，湖北得天独厚。在湖北境

内现已发现的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绝大多数为楚文化遗址和墓葬。因此，楚文化考古成为湖北春秋、战国考古的基本任务。而古矿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曾国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更为湖北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增光添彩。

50年代楚文化的考古中心在湖南，60年代之后湖北逐渐成为楚文化的考古及研究中心。

湖北的楚文化考古工作首先是从江陵开始的，包括对江陵地区楚墓的发掘和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60年代在江陵发掘的楚墓主要有：

张家山楚墓群，共发掘80余座楚墓，出土各类文物500余件。

葛陂寺楚墓群，发现楚墓50余座，清理其中的20座，出土虎座鸟架鼓等器物。

拍马山楚墓群，发现楚墓40余座，1964年发掘14座，1971年发掘27座，出土鸟篆铭文“郢君用宝”铜戈等器物。

望山1、2号墓和沙冢1号墓，这是3座中型墓，共出土铜、铁、陶、漆、玉石、丝织物共1600余件。最重要的文物有：越王勾践剑、竹简两组以及大型错金银铁带钩、彩绘木雕小座屏、嵌银铜樽、人骑骆驼铜灯、镂空杯状器等。

随着江陵地区这几批中小型楚墓的发掘，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至湖北，当人们惊叹楚文化的成就时，也带动了楚文化考古和研究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

70年代后，楚墓发掘得更多，范围也更广了，迄今在全省已发掘楚墓4000余座。较为重要的楚墓和楚墓群有：

江陵雨台山楚墓群，是为配合水利工程建设而于1975—1976年发掘的，共发掘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楚墓558座，出土各类器物4200余件。

当阳赵家湖楚墓群，于1972—1979年发掘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297座，这批楚墓对于春秋楚墓的分类和分期具有重要价值。

襄阳山湾、蔡坡楚墓群，于1972—1973年发掘春秋战国时期楚墓45座，出土一批精美的青铜器。

江陵藤店1号墓发掘于1973年，该墓随葬各类文物300余件，重要的有“越王州勾剑”。

江陵天星观1号墓发掘于1978年，该墓是湖北境内已发掘的大型楚墓之一，墓主为楚邸阳君番勑。尽管被盗严重，残存的随葬器物还有2400余件。该墓的发掘对于楚国的封君制度、封君葬制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江陵九店楚墓群于1981年开始发掘，历时9年，共发掘楚墓500余座，出土有车马及楚简等文物。

江陵马山1号墓发掘于1982年，这是一座有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规模较小，由于墓坑在天然的白膏泥层中，故棺槨和随葬器都保存较好。随葬有大批丝织物，主要有绣、锦、罗、纱、绢、绦等品种，是继马王堆1号汉墓之后发现的又一座“丝绸宝库”。马山1号墓出土有吴王夫差矛等精品。

当阳曹家岗5号墓发掘于1984年，是湖北地区已发现的春秋楚墓中规模较大的一座。随葬两具陪棺并设有附葬坑的楚墓在这一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是研究楚国中等贵族葬制的重要资料。

荆门包山2号墓发掘于1987年，是湖北境内已发掘的规格仅次于天星观1号墓的少数高级楚墓之一，墓主官居左尹，上大夫级。出土有竹简、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奁、凤鸟形双联杯、折叠床等珍贵文物。

当阳赵巷、季家湖楚墓群发掘于1988年，共发掘春秋战国楚墓26座。其中赵巷4号墓出土一批春秋中期漆器，并以较多的牲畜随葬，在已发现的楚墓中尚属首次。

4000余座大、中、小型俱全，西周末年直至战

国晚期齐备的楚墓的发掘，除出土大量珍贵的文物外，对于楚墓本身的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楚墓的分区、分期、分类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东周楚墓的年代学已经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了；除王墓之外的各个类别的楚墓在湖北境内均有发现，基本上弄清了墓葬分类的标准和各类墓的葬制特点。因此，考古工作者不仅能较准确地辨识楚墓葬，排定大型墓群的相对年代序列，而且能够准确地判定单座墓葬的相对年代。这为更深入地研究楚文化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楚墓的随葬品丰富，各类随葬品体现着楚国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已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玉器、陶器等，同时还有大量竹简出土。

青铜器器类丰富，有礼器、兵器、生活用具、乐器、车马器，大多铸造精美。礼器主要有鼎、簋、壶、敦、盘、匜等，出土于贵族墓中，诸如平底束腰升鼎等别具特色，其组合形式也与中原地区有别，形成独特的楚国青铜文化风格。兵器的特点之一就是数量多，如剑，在江陵地区所发掘的成年男子墓几乎都有出土，被盗严重的天星观1号墓出土剑仍达32件之多。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除楚器外，还有黄、蔡、邓、徐、吴、越等诸国之器，大部分应是战利品而出现于楚墓。

漆器在楚墓中大量出土，尤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地区的楚墓出土最多，一方面这是因为在东周列国中，楚国的髹漆工艺最发达，精美的漆器在当时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楚人生活之中，所出土漆器按其用途可分为饮食用器、日常用器、乐器、工艺品等；另一方面，楚地特定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漆器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湖北特别是江汉平原地下水位高，墓中漆器往往浸泡在属中性的水中，使其长期不易损坏。加之出土漆器的墓大都有棺有槨，槨外又填充青(白)膏泥，这种瓷土分子结构细密，具有较好的粘性、抗渗性，对槨室起着防腐密封的作用，为

漆器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丝织品也较为集中地出土于江陵地区楚墓，如望山1、2号墓出土文绮、绢底刺绣，雨台山楚墓群约10座墓出土平纹绢，九店楚墓群出土刺绣，马山1号墓出土完整衣物35件以及4只竹筩中盛装的丝绸碎片452件，几乎包括了我国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其中针织绦带的发现，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约公元前3世纪。

正是根据湖北等地的楚文化考古资料，有学者归纳出构成楚文化的要素主要有：青铜冶铸工艺、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美术和乐舞，它们犹如6根支柱而营造成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邃宇。

对楚城址的调查勘察、发掘与研究同样是楚文化考古的重要内容。湖北考古人员在50年代便开始了对东周城址的调查和勘察工作，迄今为止，已发现东周城址14处。其中较早的为季家湖楚城，其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规模最大的为纪南城，面积约16平方公里；规模最小为大冶鄂王城，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这些东周楚城可分作四类，即都城、别都、县邑和军事城堡。

纪南城位于江陵县城北约5公里处，因在纪山之南，故习称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郢都，经过60年代的勘探，70年代的发掘，使人们对这个上古名城的基本面貌有了概略的认识。

纪南城城垣为泥土夯筑而成，由墙身和内外护坡构成，墙身与护坡有明显的分界。现在地面上仍保存有大部分城垣，一般高出地面3.9—8米，底部宽30—40米，上部宽10—20米。整个城垣平面呈长方形，只南垣东段有一处向外凸出。西北、西南、东北城角均呈切角。城址东西长约4450米，南北宽约3588米，城垣周长15506米。

经勘探，城垣上共有城门7座：北垣2门，西垣2门，南垣2门，东垣1门。其中，北垣东门和南垣西门为水门，有古河道贯穿，今仍通水。西垣北门

和南垣西段水门已经发掘。西垣北门为两门垛三门道，并有两座门房，中间门道宽7.8米，两边门道的宽度仅是中门道的一半。南垣西段水门是一座木构建筑，以四排木柱形成一门三洞的现象。发掘表明：都城一门三道的制度，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了。一门三道的木门，迄今独见于楚都，无疑是楚人的独创，也由此可见当初郢都的水陆交通是十分便利的。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与城垣形状基本一致。

城垣的建筑年代，根据夹杂在墙身和护坡中以及叠压在城门下的遗物推断，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从宏观上看，此城南有长江，逾江而南可经洞庭湖溯湘水至苍梧；溯江而上可通巴蜀；沿水而下可通吴越；西有漳水，通蛮濮聚居的山地；北有大道，经鄢、宛可出方城；东有湖泊，曲折相通，联结着长江和汉水。楚王迁都于此，无疑是正确的决策。

从微观上看，城址位于东南两面的江湖与西北两面的丘陵之间，高低适度，既有水道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纵横贯穿，又不致为洪水所淹没。筑城垣时，遇到高地就外突包进；在拐角处，遇到洼地，就斜切回避。总之，城址的整体结构体现出楚人高明的设计思想，即不拘成法，讲究实效，在齐整中有变化，在严谨中见灵活，这是楚人的传统作风。

城内已探明的东周时期夯土台基有84处之多，多集中分布于地势较高的东南部和东北部，以东南部尤为密集，共61座，这里可能为宫殿区之所在。在城址的中部偏西北方向，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水井、窑址和与烧窑有关的文化堆积，这一带可能是以制陶为主的作坊区。在西南部新桥区的陈家台遗址，发现了一系列与铸铜有关的遗物，说明这一带有可能是以冶铸为主的作坊区。总之，其布局井井有条，十分严谨。

纪南城的面积虽不及燕下都、齐临淄和郑韩故都新郑，却大于曲阜鲁城等列国都城，是当时南中国最大的都市。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

穀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足见当年郢都之繁华程度。

四、古矿冶遗址的考古收获

红铜是铸造青铜的主要原料，红铜靠采掘和冶炼所得。中国的铜矿有着既广泛而又相对集中的分布特点。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就是位居首位的铜产区。60年代以来，在这一铜矿带上较普遍地发现了古代采冶红铜的遗迹、遗物，如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其中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1973年起，考古工作者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共清理出地下采区7处，采矿井巷近500条，炼炉多座，还出土有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铜、铁、木、竹、石等多类生产工具、装备及陶器、铜锭、铜兵器等器物。经科学检测，该矿区的开采至迟始于西周早期，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至汉代。遗址的年代上限，有可能至商代晚期。

经过不断发掘研究，发现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采矿技术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这里采用了竖井—平巷—盲竖井—平巷的联合开拓方法。所开拓的井巷呈矩形或正方形，井断面面积在西周时为约60×60厘米，春秋时期为约100×100厘米，战国时为约150×150厘米。纵横交错的井巷得以掘成，当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即工具破碎与火爆破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铜绿山古矿井附近的特大型铜斧，重15千克，其刃部磨损严重，表面布满了与刃部呈垂直方向的划痕，有的划痕很深，应是在开采矿石或凿井时与岩石强力撞击而形成的，无疑是一件用于采掘的工具。

随着井巷的开拓，安全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于是古代矿工们发明和发展了一整套木构架支护技术。

铜绿山的古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等多种。斜井的出现是开采技术的一大进步，它是沿着矿脉的走向及倾斜角度，由浅入深地向前延伸的。横巷则大多作水平走向，也有一些略为倾斜的，巷道弯弯曲曲，大致与矿脉的走向和排水的需要相适应。

总之，铜绿山的古铜矿发展至战国时期，开采系统已非常完整，开采水平相当高。

开采出的矿石，早期用人工提升，事倍功半。到战国时期，提升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在铜绿山古矿井中出土了两件战国时期的大辘轳，设计得十分科学，可提升40米，基本上具备了现代矿山提升机械的雏形。

通风、排水、照明是保证矿采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而且矿井愈深，这些制约因素就愈加突出，但这些问题在当时也已得到较好的解决。

矿石采上来后的下一道工序是冶炼。在先秦时期运输条件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为减少运输量，一般是采用采冶兼并，以炉就矿，就地冶炼的措施。在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即清理出保存较好的春秋时期炼炉8座以及炼炉周围堆积着的大量炼铜炉渣等。在铜绿山发现的炼炉是竖炉，是炼铜成熟阶段的产物，足以代表当时在该领域的水平。

铜绿山的春秋时期竖炉构筑方法相近，尺寸大体相同，主要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竖炉的炼铜工艺是铜的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只要有足够的风压和风量，就能进行正常的冶炼；只要炼炉的熔化带中有足够的温度，矿石不论品位高低，不论块矿或粉矿，都可以炼出红铜来。总之，炼铜竖炉还具有热效率高、炉龄较长、炉料处理量较大、检修简易、操作方便等优点，不仅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水平的炼铜技术，而且为战国以至秦汉炼铁技术的提高创立了较好的基础。

铜绿山古矿区的许多地区覆盖着古代的炉渣，厚度往往在1米以上，经检验，平均含铜量为0.7%，而含铁量在50%上下，可见是炼铜的炉渣。当地古

炼炉炼渣的总量，估计在40万吨左右，这意味着古代炼出的红铜为10万吨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铜绿山古铜矿的采冶者为古越人，楚国至成王时才完全控制这里的古铜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楚文化考古的一部分。

五、曾侯乙墓的发掘

1978年，湖北考古工作者在今随州市郊擂鼓墩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墓，墓主曾侯乙，故习称为曾侯乙墓。该墓的发掘，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是一座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方向正南。墓坑底部用171根长方形条木垒成椁室，椁室分东、中、北、西四室，各室隔墙底部有小方洞相通。

东室：为墓主寝息之所，放置主棺1具，陪葬棺8具，殉狗棺1具，还有许多玉器、漆器及少量车马器、兵器、乐器、骨角杂器、丝麻织品等。

中室：为钟鸣鼎食之处，主要放置以65件一套的大型青铜编钟、32件一套的石编磬为中心的乐器和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青铜礼器。

西室：为妙龄少女乐舞奴婢的殉葬地，放置陪葬棺13具及少量饰物。

北室：为车马兵器库，主要放置车马器、兵器、竹简和一对青铜大尊缶。

墓中共出土文物15000余件，其中乐器9种125件、青铜礼器和用具36种134件、兵器8种4777件、车舆和车马器9种1127件、漆木器26种5012件、金器4种9件、金箔13种940片、玉石质制品26种602件、竹简240枚等，一墓出土文物数量如此之多，罕有其匹。

保存良好的曾侯乙墓及其不曾扰动的出土文物，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艺术史、科学技术史以及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在考古学上，确定器物年代是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曾侯乙墓因墓主身份、下葬年代十分明确，从而为研究东周墓葬尤其是战国早期墓葬提供了准确的断代标尺。

该墓出土青铜器6239件，总重量约10.5吨。其中包括青铜礼器、用器36种134件，编钟一套65件等，是历年来出土青铜器种类最全、数量最多的一次，不仅解开了考古学上的一些疑团，在许多方面又为考古学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如殳，古籍多有记载，为“五兵”之一，长期以来却不知其形制如何。曾侯乙墓出土两种形制不同的殳，且殳有自铭，随葬遣策又有记载，实物简文互为佐证，冷兵器史上的一个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

尊盘由一尊一盘组成，出土时尊置盘内，由尊盘的出土，可推定安徽寿县蔡侯乙墓也出土有同类器物，且不止一套。

出土的青铜礼器器类齐全，组合完整，九鼎八簋及分三面悬挂的钟磬，都表明是严格遵守周代礼乐制度的，这与楚国直至战国末期的楚幽王仍恪守九鼎八簋之制是一致的，是对周礼的保守。但所用正鼎是楚式的束腰平底鼎，则是受到楚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曾国文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楚文化，但可纳入楚文化的系统之内，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材料。

在音乐学上收获更丰。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均钟等9种乐器共125件，另有钟磬演奏工具12件，钟磬架以及挂件、磬匣、鼓座、琴轸、瑟码等附件1714件，是历年出土乐器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保存最好的一次，在先秦音乐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一，保存完整的乐器为先秦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如十弦琴、均钟（五弦琴），篪为几种失传的先秦乐器；建鼓和笙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同类乐器；编磬则是所见先秦编磬中件数最多、悬挂排列方式最清楚的一套，编钟则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

青铜乐器。

其二,编钟钟体上的铭文共计2828字,内容有三:一为铭记,全部甬钟在其钲部都有“曾侯乙作持”五字,表示该钟为曾侯乙所制作和享有;二为标音,在钟体上的正鼓、右鼓或左鼓标出这两个部位所能击发出的乐音名称,即阶名和变化音名;三为乐律关系,为律名对应关系、阶名对应关系和八度音表示法。加上钟架横梁、悬钟挂件上的铭文共计3755字,是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惟一的一部乐律学专著,它是打开中国先秦时期音乐殿堂之门的钥匙。

其三,证实了中国的十二律系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否定了中国音乐史上由三分损益法产生的十二律系战国末期由希腊传来而稍微汉化的乐理的传统说法。

其四,通过实际演奏,一钟发双音,且每件钟的两音之间都呈三度和谐关系,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钟体上标音铭文的正确及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其音律自 C^2 至 D^7 ,中心音域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曾侯乙墓出土的钟、磬古乐器,以其庞大的规模,完整的组合,精美的形制,动听的乐音,向今人全方位展示了“金石之声”发展到巅峰时期的音乐世界,揭开了人类音乐史上沉寂两千余年的辉煌篇章。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还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多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在天文学和冶金铸造上的成就。

在该墓出土的漆器中,几件衣箱上的彩绘反映着当时有关天文学的知识,或绘有传统的后羿射日故事,或绘有日月星辰的星图。其中一件箱盖正中朱书“斗”字,四周写有二十八星宿全部名称,东西两侧分别绘有苍龙、白虎图像。它的出土,说明我国在战国早期以前就已存在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

曾侯乙墓青铜器群,代表了铁器普遍运用之前

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主要表现在:复合范铸造技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如编钟的铸造反映了这一点;分铸法有了新的进步,一些形大体重的器物如大尊缶的铸造成功,是中国古代分铸技术成熟的一个标志;铸接、焊接技术完美;铸镶、错嵌工艺成熟;失蜡法的应用达到新的高度,如尊盘上精美的附饰就是运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杰出作品;装饰华美,装饰手法广泛,广泛采用阴刻、浮雕、镂空和镶嵌等。

总之,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宏富、博大、精深,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中国先秦文化的认识,而且还改变了对当时长江流域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

六、秦汉考古收获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包括湖北东部在内的楚国东境全为秦所占领。早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秦人就占领了楚国的西境,即湖北的西部。因此,在白起拔郢至秦灭楚的50余年时间里,湖北东、西部分属秦、楚统给。

在楚人统治的鄂东地区,发掘了一批战国晚期楚墓,依然保持着楚人的文化面貌,其随葬器物、埋葬习俗与江陵楚墓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秦人统治的鄂西地区,已发掘百余座秦墓,主要分布在宜城、云梦、宜昌和江陵等地。由于秦人在占领区内实行严密控制,包括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乃至风俗习惯都强行秦化,因此,所见秦墓的埋葬习俗都采用了秦制,楚的影响已微不足道。

已发掘的战国晚期秦墓都属小型墓,稍大者随葬数量不少的漆器,有的还有成组或不成组的青铜礼器、木俑等。一般的只有日常陶器,其差别可能与秦国实行的军功爵有关联。

秦统一中国后,秦人在湖北地区的据点仍在云梦。在云梦及其附近地区发掘了一批这一时期的秦墓,出土了一批秦式青铜器和大量漆器,在云梦睡虎地还出土了1100多枚竹简。

汉代考古在湖北主要以墓葬发掘为主。西汉墓迄今已发掘300余座，分布在全省各地，比较重要的有江陵凤凰山、毛家园，宜昌前坪和葛洲坝，襄阳擂鼓台、光化五座坟，黄冈太平寺等，所发掘的墓葬均为中、小型墓，可分早、中、晚期。各墓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全国其它地区是一致的，说明随着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各地区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地区差别日益缩小。

东汉墓葬在全省各地已发掘100多座，大都为砖室墓，在枣阳、当阳等地还发现一批画像砖墓。随葬器物以日用陶器罐、盆、钵、甑、釜和模型明器仓、灶、井及反映庄园经济的六畜俑和碓、磨等明器为主。

秦汉墓的发掘数量不及楚墓，且墓葬等级偏低，但出土了大量漆器和简牍，成为湖北秦汉考古的重要收获。

漆器主要出土于秦墓和西汉前期的墓葬，由于当时葬俗多沿袭楚人用青(白)膏泥填塞椁室周围的习惯，因此，漆器保存较好。

秦墓出土的漆器主要有圆盒、奩、卮、壶、扁壶、盂、勺、耳杯、双耳长盒、长方盒和樽等，胎骨主要是木胎和夹纆胎两种，还有少量陶胎漆器，制作方法为挖制、卷制和斫制，装饰图案优美。

西汉漆器和秦漆器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从器系、器形到纹饰，都较为相似。

大批保存良好的漆器为研究当时的髹漆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

湖北秦汉墓出土的简牍数量多，内容重要。

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出土秦简1100多枚，在龙岗秦墓又于1989年出土150多枚，不仅填补了秦简出土的空白，还对秦的社会、经济、法律、军事、文化、风俗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汉简出土的数量更多，如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175枚、9号墓出土80枚、10号墓出土170多枚、167号墓出土74枚、168号墓出土66枚，木牍共10余枚；

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247号、249号、258号)共出土汉简1000余枚。内容涉及医学、数学、军事、历谱、遣册等，对于探讨汉代社会、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七、六朝隋唐考古的收获

六朝时期，地处长江中游要冲的湖北，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湖北的六朝考古，主要是武昌城的调查、勘探与墓葬的发掘。

武昌城位于今湖北鄂州市，建于三国东吴黄初元年至二年(公元220-221年)，距今已有1770余年，是南方现存六朝古城中最早的一座。武昌城曾两度作为孙吴的都城，时间长达10年左右。

武昌城南朝时便遭废弃，城址的使用年代仅限于六朝时期，它较完整地保留了六朝都城建造的原始面貌，因此，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武昌城的发掘与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从70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对武昌城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发现武昌城平面大致为长方形，东西长度仅为1100米，南北宽约500米，周长约为3300米。城的东、西、南三面都有城垣，夯土筑成，南面城墙上马面结构痕迹。城垣外侧设有城壕，深5米以上，宽50-70米。城的四角设有角楼。诸如城址的平面呈东西向的横长方形、单一的宫城、“马面”和“角楼”都属于古城中较早使用的实例。

六朝墓葬在湖北迄今已发掘800余座，主要集中于鄂州，此外在武汉、荆州、宜昌、黄冈等地也有所发掘。一批墓葬有纪年，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葬和文物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国时的中型砖墓主要有凸字形、刀字形、长方形等形制，随葬品除沿用在东汉时期的陶质模型器物 and 原始青瓷外，还新增添了不少器类，如长方果盒、盘口壶、香薰、跪俑、虎子等。其中青瓷器所占比例最大，如武汉黄武六年墓出土的圆体青瓷

虎子，烧造较精致，比南京出土的赤乌十四年的长体青瓷虎子，至少要早24年。

两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形制变化不大，墓底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以青瓷器为主，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两大类。鄂城东吴孙将军墓出土的“孙将军门楼”，反映了当时豪强大族的府第建筑情况。

六朝铜镜在各地出土较为普遍，以鄂城出土的数量最大，品类也较多，有规矩镜、柿纹镜和神兽镜等。鄂城出土的大量铜镜，证实了鄂城为当时的又一铸镜中心。

湖北地区的隋唐考古工作主要是一批墓葬的发掘，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起，在武昌周围已发现此时的墓葬300多座。此外，在其它地区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如湖北郢县发现的李泰家族墓地、湖北安陆发现的唐吴王妃墓葬等，都是南方地区迄今已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大型墓葬。湖北的这批隋唐墓葬及出土文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方地区隋唐时期的文化面貌。

湖北地区隋唐墓葬的建筑方式，有别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基本上沿袭了本地区传统的风格，以竖穴土坑砖室墓为主，墓室内有棺床、祭台、排水沟、灯龕、耳室等附属结构。

所出土的随葬品丰富多彩，根据用途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陶瓷生活用具，其数量最多，组合最全，线索最清楚，演变规律清晰，是湖北地区隋唐墓分期断代的标准器物。陶瓷俑及其明器，陶瓷俑有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俑、男女倚俑、女乐俑。武昌何家垅出土的一组乐伎俑，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颇具特色。

八、宋、元、明考古的收获

湖北的宋、元、明考古，以墓葬发掘为主。

宋墓在武汉、黄陂、枣阳、荆门、襄樊、麻城等处都有发现，其中以武汉发掘的居多。宋墓均为

中小型墓，有土坑墓、石室墓、砖室墓、碗室墓、洞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各种结构，在汉水中游多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三峡地区则发现一批洞室墓。许多墓还发现有墓志和买地券。墓中一般随葬瓷质生活用具。

对蕲州宋代罗州城的发现，印证了此城是毁于战火的文献记载。

宋代的窑址在湖北发现较多，仅在梁子湖周围就有上百座之多。近年对江夏区青山窑和王麻窑等窑址进行了发掘，首次揭示出本地区瓷窑的特点，填补了长江中游瓷窑考古的空白。

60年代在黄石西塞山发现了一座宋代钱币窑藏和一坛宋代银铤，出土了多达10余万千克的西汉初至南宋淳祐十二年之间的各个朝代的铜钱，为我国古代货币史提出了丰富的资料。

元代墓葬发现较少，已发掘的有1984年在黄陂周家田发现的“韩门肖氏淑贞二小娘墓”。

明代墓葬发现较多，已发掘的有明朝首辅张居正墓等一批等级较高的墓葬。在钟祥、江陵、武昌等地等发现一批藩王墓，其中钟祥显陵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先后发掘的楚昭王朱楨墓、江陵辽简王墓和湘献王墓，出土有大批金银器和金封册等文物，对研究明代藩王葬制和葬俗具有重要意义。

九、结语

50年来，湖北的考古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湖北考古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先秦考古，其中尤以楚文化考古最为突出。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湖北楚文化考古工作的卓越成就直接推动了楚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影响和推动了先秦区域文化的研究。现在，楚学正成为一门显学，受到国内外汉学家的青睐。

陶器与陶塑



考古发掘表明,湖北地区的制陶业始于8000年左右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这也是湖北地区出现最早的家庭手工业,其所制陶器表现出一种简朴、原始的风格。

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采用较原始的泥片贴筑法制成,器物造型多不规整,器表凹凸不平,口沿波状起伏。器类简单,形态也很随意,以圜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主要器类为釜、罐、盘、支座及陶纺轮等。陶质以夹碳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器皿可能是在露天烧成的,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易碎。陶器绝大多数为红褐色,由于温度不匀,同一件器物往往有几种颜色。陶器大多有纹饰,主要为绳纹。秭归朝天嘴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陶罐,小口,短颈,溜肩,深腹微鼓似桶。平底内凹。肩上有对称的两个小镂孔,还刻划有波折纹一周同出的一件陶支座,造型厚重,器形如猪头,顶倾斜,下部中空,呈喇叭形,中部有两镂孔,酷似猪眼,便于手指提取。

至大溪文化时期,制陶工艺和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在其早期阶段,开始用慢轮修整以泥条盘筑法制成的胎坯;至中期,慢轮修整成型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所制陶器显得圆正、轻巧、美观。此时,由于对陶土进行细致净选和反复揉练,陶胎中的杂质逐渐减少,陶胎也逐渐变薄。不仅细泥红陶器大量出现,还能烧出蛋壳彩陶。如天门谭家岭遗址出土的一对蛋壳彩陶碗,器壁较薄,造型浑圆,是在烧制后施以彩绘的。

大溪文化晚期,在长期慢轮的基础上,发明了快轮制坯成型,既提高了质量,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一部分黑陶、灰陶,还有少量的橙黄陶、白陶和黑皮陶。泥质红陶大部分表面磨光,施以深红或鲜红的陶衣。一部分红陶器表为红色,器内呈黑色或灰色,有的延至口沿外部,这种“外红内黑”的陶器是大溪文化比较流行的较有特色的陶器,这或许是在烧制技术上

流行渗碳工艺的结果。

所出土的陶器大多为素面,有纹饰的也不少。纹饰有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弦纹及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是戳印纹和彩陶纹饰。戳印纹是用棍棒或指甲,在器壁上由外向内戳印,但并不戳透,多饰在器皿的圈足上,其数量多,且延续的时间长。彩陶数量有限,主要是红地黑彩,也有的黄地褐彩,或白衣上绘红、赭、黑彩,形成多彩。典型的彩陶纹样是横条纹、人字纹、水波纹、绳索纹,它们几乎都是取材于水的不同流态,表达了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与水为伴的深切感受。彩陶器主要为碗、杯、罐、壶、筒形瓶、豆、盆等。

大溪文化陶器的种类较多,有碗、钵、碟、盘、盆、豆、杯、壶、瓶、簋、鼎、甑、罐、釜、器盖、器座、支座等10多种。这些陶器中数量较多的为:釜,早中期的主要炊具,器座和陶支座与之配套;鼎,中晚期的主要炊具;碗、圈足盘、豆、曲腹杯、簋,为当时盛行的炊食器皿。最具特色的器物则为双折壁圈足碗,折敛口的浅腹圈足盘、折敛口形豆、单耳彩陶杯、筒形瓶、圈足罐形簋、曲腹杯、鼓腹与直腹瓶等。这些器物与上述的陶质、陶色、纹饰等一起,构成了大溪文化陶器的基本特征。

屈家岭文化是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的制陶技术故多有传承。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更为高超,造型美观大方,器体规整轻巧,善于将实用与美观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所出土的陶器以灰陶较多,黑陶次之,余为黄陶和红陶。夹砂陶的胎和料选用砂粒或陶末。以素面陶为主,纹饰中凸弦纹明显增多,主要器形有宽扁足腹盆形鼎,短柱足罐形鼎、甑、豆、钵、盆、三矮足碟、罐、高颈扁腹圈足壶、盂形器、双腹圈足碗、喇叭形口矮圈足杯、高圈足杯等。很多鼎、豆、碗的器身是仰折的双腹,特点一致,再根据不同用途分别安接圈足或三足,表现了制陶规范化的趋向。通常厚度为0.5~2毫米的薄胎陶器,高40余厘米

陶

器

与

陶

器